



主编 周宪 许钧

# 知识分子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与

## 法兰西激情

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著

刘云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主编 周宪 许钧

# 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与

## 法兰西激情

20世纪的声明和请愿书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著  
刘云虹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法]西里奈利著;刘云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14-02981-2

I.知... II.①西... ②刘... III.知识分子—研究—法国—20世纪 IV.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279 号

书 名 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  
编 著 者 [法]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译 者 刘云虹  
责任编辑 蒋卫国 沈晓平 周晓阳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125 插页 2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981-2/G·986  
定 价 23.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知识分子译丛总序

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浪漫的激情渐渐隐去。法国哲学家福柯悲哀地说,“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只剩下在各专业领域里忙碌的“专门家”。与福柯的悲观主义不同,大约十年后,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社会学家艾尔文·古德纳则欢呼雀跃知识分子“新阶级”的诞生,他历数“新阶级”的种种特征,尤以拥有文化资本而迥异于传统的财富资本拥有者。然而,乐观主义的好景不长,几年后另一位老派美国知识分子拉塞尔·雅各比抛出一本轰动知识界的书,其标题极富象征意味——《最后的知识分子》,福柯的悲哀好像又卷土重来。只要对西方学界文献稍加翻检,便会发现知识分子乃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主题。当然,谈论知识分子并不轻松。

新千年伊始,一个知识爆炸性增长的时代图景日趋明晰。“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时代”、“信息社会”、“专业社会”林林总总的描述,似乎都在确证一个共识:知识的急剧增长在深刻地改变我们的世界。于是,专事于知识生产、传播乃至消费的社会角色的讨论,也就合乎逻辑地多了起来,热闹起来。

回到了福柯的命题:如今专家有的是,但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

福柯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眼中的知识分子是啥模样?也许,每人心中都有自己关于知识分子想象性的建构,都在反思自己该如何履行这个称谓的角色行为。换言之,何为知识分子的

100/65

提问,决非抽象概念的厘定,更是一个实践理性问题,关乎当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的认同和行为问题。

追问何为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因为当代社会的确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境:专业社会中职业分工越加细密,学院体制越来越制度化,知识与常识的距离越来越远,技术的工具理性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和思想的各个层面。一言以蔽之,种种难题凸显面前:知识分子与权威的关系如何?知识分子在当代与民众及其社会运动有何联系?知识生产的制度化、学院化是否正在改变知识分子的功能?怎样在“专门家”与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关联?如何在大众媒介霸权盛行的社会中践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全球化和发展不平等的格局中,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什么是知识的政治?何为批判性话语?……无数新的难题构造了我们这个时代关于知识分子话题的特殊语境。于是,从个人身份到群体作用,从制度安排到理论话语,从国家利益到世界公民,从专业知识到民众教育,毋庸置疑,善于反思的人总是面临着更多的困惑。

反观中国,近代以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变中,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从识字扫盲到远涉重洋寻找真理,从兴办学堂、书局到国民性批判,从宣传马克思主义到介入伟大的社会革命。摆脱了传统文人仕与隐两难困境的现代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卷入了宏大的历史变革实践。鲁迅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准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此话真矣!今天,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在社会面临急剧变革的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无疑遭遇到更多的挑战 and 困境。

据此,我们选编了这套译丛,旨在透过西方知识分子问题的

讨论,寻找一些有价值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诚然,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去甚远,我们也未必赞同诸种理论观点,不过,他山之石,毕竟可以攻玉。

周 宪 许 钧

2001 年 6 月于古城南京

## 前 言

1977年,让-保罗·萨特已是72岁高龄,忍受着疾病和几乎失明的痛苦。然而,西蒙娜·德·波伏瓦1981年在《告别仪式》一书中写道:“那一年,和以往一样,他在《世界报》上发表了大量的署名文章:1月9日,呼吁援助处境维艰的《政治周刊》;1月23日,呼吁反对在摩洛哥实行镇压;3月22日,给拉瓦尔法院院长写信,声援被指控拒收军籍簿的伊万·皮诺;3月26日,抗议尼日利亚一名歌手遭逮捕;3月27日,呼吁为阿根廷争取自主权;6月29日,致信给贝尔格莱德会议,反对在意大利实行镇压;7月1日,抗议巴西政治局势恶化。”<sup>①</sup>

的确是工作繁重的六个月啊!尤其是,如果说经过查实,西蒙娜·德·波伏瓦提及的某些请愿书——1月9日的、3月22日和26日的——并没有发表在《世界报》上,而很有可能是发表在法国的其他报刊上,那么,从对这份日报的整理中同样可以证实,让-保罗·萨特就在这六个月中还在该报发表了其他署名文章:2月2日,声援一名被拘禁在精神病院中的为人权而斗争的

---

<sup>①</sup> 参见《告别仪式》,西蒙娜·德·波伏瓦著,加利马尔出版社,1981年,第133页(除去特别说明之处,注释中提及的所有著作的出版地均为巴黎)。6月29日的文章更为明确地针对“当时正实施的对工人活动分子的镇压以及在与历史性妥协的斗争中产生的思想分歧”提出的抗议。

苏维埃军人;4月3日至4日,给维德拉将军写信,呼吁他对一名阿根廷大学教员失踪一事进行干预;5月8日至9日,声明“反对一个德美的资本主义欧洲”;5月27日,揭露左派政党在核武器问题上态度完全转变;6月1日,致信波兰驻巴黎大使馆,反对在华沙的多次逮捕行动;6月12日至13日,谴责欧洲议会在普选中设下选举“骗局”;最后,6月17日,声援被关押的泰国大学生。

然而,我们不能去嘲笑一种请愿行动,尽管流逝的时间并不一定总能在追溯历史时证明它的有效。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在那里,总是有一种历史目的。诚然,在请愿书这方面,萨特的情况是一种应该加以平衡的强度指示器。因为1977年的这前六个月,作家继续勇往直前,成为1945年以后这一方面的绝对冠军:1946年10月至1958年10月,他是所有在《世界报》或同等地位的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的作家中笔头最勤的一个,在统计出的总共125篇中,有28篇署有他的名字,超过了克洛德·布尔代、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让-玛丽·多梅纳克和让·卡苏,他们在20至22篇文章上签过自己的名字;而且,在戴高乐共和国时代,从1958年秋天至1969年春天,他依然走在最前头,这一次是超过了洛朗·施瓦茨。毋庸置疑,透过这种萨特现象,正是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密集参与和他们政治活动的“一种最具特色的方式”<sup>①</sup> 在这里向历史学家提出了问题。

---

<sup>①</sup> 参见《知识分子与政治》,勒内·雷蒙著,《法国政治学杂志》第四期,1959年12月,第864页。对于此类集体文章,最常见的区别是“请愿书”和“宣言”之分,前者是面向一种“权威”(小拉鲁斯词典注),而后者并不一定有明确的接受者,若有则是国内或国际的公众舆论。此外,一封请愿书常常引导出“要求”的概念,而宣言则更在于一种原则性声明的方式。在实践中,这两种类别的集体文章之间的差别有时是微乎其微的。

## 宣言中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本书要讨论的正是法国的知识分子。研究者因为受到恫吓而不再对这些知识分子进行考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时,因为属于近代史并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内容,这种研究几乎是一个忌讳的话题。毫无疑问,一种新的局势已经形成,有助于消散这种胆怯的心理。因为,历史学家从1970年——当时,知识分子阶层恰好进入一个动摇接着是恐慌的时期,这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开始不再那么犹豫地在投身于这片研究领域,这并非一种巧合;于是,也正是当知识分子开始从他们的宝座上走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历史才得以成为一种庄严的历史。马克·布洛赫曾对法国大革命的专家们提出恳求,发出强有力的质疑:“罗伯斯庇尔主义者,反罗伯斯庇尔主义者,我们请求你们发发慈悲;可怜我们吧,告诉我们最简单的一条:罗伯斯庇尔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后,历史学家为让-保罗·萨特提出同样的问题便逐渐成为可能,而不至于被指责实行这个或那个阵营的——有时仍是互相对立的——知识恐怖主义,被责令追根究底地在萨特与加缪或萨特与阿隆<sup>①</sup>之间做出正确评价。于是,思想大师们的秋天带来了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们的春天。<sup>②</sup>

这一变化无疑是有益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是一种

---

① 法国作家、政治家(1905—1983),作品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诸多方面。——译者注

② 意识形态的这一面融合在知识分子历史中一种更为广阔的挣脱禁锢的背景之下:在这一点——同样也在所有涉及定义的问题上——我在研究中冒昧地参考了《知识分子》一文(见《论一种政治历史》,勒内·雷蒙主编,瑟伊出版社,1988年)。

自我定义、自我声明、自我评价或自我批评甚至是自我鞭笞的内在的文学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个“自我的展台”与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这一科学、客观的途径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而惟有这样一种保持一定距离的途径才能够回答以下两个基本问题：20 世纪的知识分子是否对重大事件，并由此对我们国家的历史产生过影响？这种作用——如果它存在的话——处于一种平稳状态，还是相反，在不断扩大呢？

对此类问题难以作出回答，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不仅由于各种的自我展现，同样也因为一些有偏见的观点而被歪曲。一种是道德的、史诗般的，把知识分子看作 20 世纪一切伟大事业中的勇士；另一种则相反，是论战式的，把知识分子描绘成堂吉珂德式不负责任、三心二意的人物——并且是危险的，他们后面还跟着无数的桑丘·潘沙——以及社会骚乱的根源和国家解体的起因。于是，对左派知识分子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便由此形成：对于一些人来说，知识分子是法兰西意识的守护天神，他们无数次拯救了它的荣誉，而有关德雷福斯的种种事件标示出他们整个世纪的历史，在那些事件中，正义的一方每次都显而易见；相反，在右派眼中，他们一方面行动起来犹豫不决，就像吸食了知识界鸦片的人那样，另一方面却又在一番痛苦但不一定是清醒的觉悟之后，极度兴奋地投入战斗。而且，知识分子的形象常常是混乱的，不仅仅在另一个阵营的知识分子眼里如此，同样，在时常是困惑、谨慎甚至有些敌意的公众舆论中也有所反映：作为个人，他们的介入将是些离奇的想法；作为一个集体，他们则具有施加压力者有害的一面。

然而，在黑色传奇和圣徒传之间，在离奇想法和施加压力者之间，历史学家还是可以凭着良心进行他的工作，去超越那些歪曲的或是断裂的反映，特别是，力图去评估知识分子所产生的作

用和影响。这一切尤其要在描绘出他们参与国家生活的曲折经历之中完成。因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中显然存在着一种由多种参数标示出的周期循环:其中包括他们介入的广度以及对他们内部的左派、右派力量对比的估计。

总体上,这种广度是逐渐增加的。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学家面对着一研究经济史的同行们所称的世纪**趋势**——一种“沉重”的趋势。的确,在这样的总体方向中,循环周期是比较短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国家动荡时期中有一些更为激烈的阶段。此外,这一事实中也有本书成书的另一原因。本书不仅透过知识分子的请愿书来探寻他们的历史,同时也意欲对法国 20 世纪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对其中最为动荡的几个时期做一番研究。换言之,也是对英国历史学家西奥多·泽尔丹的一本著作的标题的阐发,其中有着一种研究“法兰西激情”史的可能途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对知识分子的宣言和请愿书的研究能够让我们探测、觉察到这些激情中的某一部分,条件是将其中的种种迹象加以均衡。

## 思想、文化及心理

事实上,知识分子的历史理应在政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政治史正是当前史学编撰中重新充满活力的分支。如果人们把政治史看作一个总体途径,去研究标志着国家生活节奏及基础的个体或集体行为,那么,我认为,对以下三个方面应加以分析:大的思想体系、政治文化以及表现体系和价值体系。因为,政治史是行为与感觉、文化与思想的历史,不能把政治仅仅表现为选举,相反,应当将它扩展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中去,后者曾被一种少数政治寡头之间默契的雅尔塔方式排除在政治领域之

外,而仅仅被归结于所谓社会历史中。当然,这并不涉及到剥裂所有相邻、关联的历史,也不意味着否定它们在历史活动中的合理性与多样性,除了政治史,这些历史活动在解释过程中完全可以偏重其他的途径及层次关系。但是,政治史的丰富内容仍然在于它必须力图完成自身的使命,对从选举到舆论动向的各种集体行为加以分析,并且,为了解释准确而对整个基础——思想、文化和心理——进行探寻。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的历史——尤其是透过宣言和请愿书这类集体行为所表现出的——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在这里,从各种主流思想的平行存在到各种心理状态的土壤,这一意识形态循环的问题便被提出。意识形态如何——只是可能——在一个既定的时期渗透到重大的讨论中去?这些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之间是何种关系?而在那一时期,政治文化决定着国民讨论及那些扮演重要角色的政党的世界观。然而,整个国家的表现和敏感性又是怎样的?这两种较高的水平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或相反地具有不可渗透性?①

在知识分子的和声与不同时期的国家历史这一充满动荡的激烈乐曲之间,结成了多种复杂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探寻触及到政治的内部,也让知识分子的历史成为观察我国历史中多种基本方面的一扇敞开的窗户。

---

① 我已经在《知识分子》(出处同前)和《一代人与政治历史》(见《20世纪.历史杂志》,第22期,1989年4月至6月)中提出过此种研究政治现象的三元途径。有关法国当代历史中的“心理状态”及它们与政治文化之间的研究,参见莫里斯·阿居隆主要的、开此类研究之先河的著作。

## 观象台和地震仪

诚然,关于这种知识分子的历史,试图进行首次综合的时间已经来到了。<sup>①</sup> 不过,就目前而言,这种准备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空间是敞开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全部结束,仍有一部分研究工作一直在等待着它们的历史学家。在这场搜寻的战斗中,可能的途径之一恰恰是对请愿书的研究。

事实上,这样的途径使得安置一个观象台和一台地震仪成为可能。观象台用来观测知识分子的社会性结构。其实,作者确信<sup>②</sup>,为了书写知识分子的历史,有三种工具显得尤为有效:对路线的研究,对几代人的阐明和对知识分子阶层各种社会性结构的揭示——社会性在日常用语中通称为“网络”。前两条轴线已经在此前的一部著作中被广泛应用,该书致力于研究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及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学生中出生在20世纪初的一代,他们从一个和平主义的母体开始,在30年代及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时期里走过了具有鲜明反差的一条条路途。<sup>③</sup> 这部著作同样也对大学生阶层中按年龄和学业结成群体

---

① 参见《法国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至今》,帕斯卡·奥里、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著,阿尔芒·科兰出版社,1986年。

② 参见《偶然或是必然? 一种形成中的历史:知识分子的历史》(《20世纪。历史杂志》,第9期,1986年1月至3月)(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著)。“社会性”一词借用自莫里斯·阿居隆,他曾把这一词广泛运用在知识分子阶层以外的其他各阶层。我确信,为研究知识分子阶层,运用社会性概念是可行的,尤其在我此处所赋予它的意义中。

③ 参见《知识的一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和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学生》,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著,法亚尔出版社,1988年。

时的某些社会性网络——阿兰的学生们的缩影——及它们的前历史进行了研究。

但是,如果对这一大学生阶层的考察有益于对某些社会性结构的研究,那么,其他的各种途径也能够对此有所帮助。特别是,出版社的历史应该使它们内部和周围的复杂联系得以显现:所有内在性结构——例如,阅读群体这一既接纳又排斥的因素——和由作者组成的外围,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sup>①</sup> 同样,对研究者而言,杂志的编辑群体既是“建立在[这些]杂志的诞生与影响之上的一种冲动的历史”的标准器,又是一座阳台,为对知识分子社会性的研究提供了不会被遮挡的开阔视野。而且,在一番梳理之后,对请愿书的研究似乎也成了——一个珍贵的观象台,用于确定出某个既定的时期内构成法国知识阶层的力量范围。因此,这个群体——或者说小社会——的“运作”以及它的成员和小气候在这里同样都是涉及到的问题。

然而,这仅仅是使得我们对宣言和请愿书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其他同样重要的原因仍然存在。正如观象台对知识分子的某些社会性结构有着历史性的回顾,同样,请愿书的历史也可被看作一个地震仪,使我们能够洞察时代变迁中法国知识阶层的波动和震颤。而且,我们会再次发现已经指出过的本书所确立的双重目的:力图以一种独特的角度书写法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史,与此同时,也致力于研究 19 世纪末以来曾使国家动荡不安的重大变故。

条件仍然还是要对请愿书历史中所表现出的种种迹象加以

---

<sup>①</sup> 参见皮埃尔·阿苏利纳的著作《加斯东·加利马尔》(巴朗出版社,1984 年)中提供的大量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研究了以其名命名某物的英雄人物及在他周围不断形成的变化。

均衡。因为,在两种表达意义上,有三点必须立即予以澄清。首先,我们会看到,请愿书和宣言最经常的情况是表现了国民意识中一个混乱的阶段以及思想上一段分歧的时期,但也并不总因而就能反映出争论的全部。事实上,真正的请愿书之战——对有知识分子参与的危机的最纯粹的证明——是很少的,请愿书成为两个对立阵营的使者,在表明各自立场的同时,又对双方做出了详尽的介绍,同时为双方提供了自我展现的阵地。可以肯定的是,本书中将对这些战斗进行研究,而它们所产生的反响常常在知识分子们的记忆里留下深深的印迹,直至今日。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指出,请愿书或宣言仅仅反映着单独一个阵营的抗议或高谈阔论。这丝毫没有影响研究的意义,因为被研究的语言的光彩来自它自身的历史目的,并且反映出其他方面的一种危机或争论——从议会强烈的声音到多种形式的公众感情。

请愿书这种经常的一面性——而且是实质上的——带来另一个结果,迫使我们进行一种再一次的均衡,或者至少是,提出一种询问。两种倾向的知识分子是否都是同样程度的请愿者?还是,就这个观点而言,通过更大量的请愿书来展现自己的左派建立起了一定的优势?再或者,换一种方式提问,我们是否应该认为,请愿书在左派中是多发而常见的<sup>①</sup>,在右派中却只是一时的现象?这样一个可能会使研究失去某个存在理由的问题不仅不能被作为前提,而且——假设它是有根据的——还将使得均

---

<sup>①</sup> 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请愿行动在右派中有时被描述为一种持续的偏离,一种无节制的写作。而请愿者——当然是左派的——因此只能是一个可悲的老先生。自从在涉及毒气室时使用了“细节”一词而引起反响之后,让-玛丽·勒庞便对“人权专家、反种族主义盟员及左派请愿者”加以指责。(参见《费加罗报》,1987年9月19日至20日,第8页)。

衡的问题更为棘手。右派知识分子中的请愿者是否会仅仅因为几十年中他们的重要地位在逐渐衰退而变得越来越少？换言之，右派知识分子斗争的力量是否会随着他们自身养分的失去而逐渐变弱？或者说，右派知识分子是否会因为敏感，因为历史遗留因素，或根据他们对自身作用的表现而不那么倾向于此种表达方式？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所有被记录下来的波动构成了知识界准确的脑电图，其中，右派在 1945 年后经历了一次无可置疑的消沉：既然，至少在 1945 年之后，两派对请愿书所怀有的不同激情将得到一份结构化的证明，那么左派、右派之间的均衡将不再是必需。第二种情况恰好相反，对脑电图所指示的迹象必须加以均衡，以使知识分子阶层中右派的行动不至于被缩小。

在各种原因，各种图表上，对请愿书的研究都标示出一条轨迹，它的坐标既是按年代的——随着时间而进展——同时，又表示出某个既定时期的强度变化。这一证明又带来第三个评价的问题。宣言中所显示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并不是对国家冲突与紧张局势的简单反映。诚然，我们将会看到，宣言和请愿书体现出法国所经历的危机的历史。但是，知识分子们扩大了其中的一些，又缩小了另一些，改变了某些危机发展的方向，而对另一些却没什么影响。因此，这种反映是珍贵的，但同时又不够确切。或者，不妨再来做一次比喻，知识界的脑电图可以对国家的某些震动有所显示，但却不能因此与该社会的心电图完全处于同一相位。

### 一种印象派的方法？

我们已经说过，重大的宣言和请愿书的历史同样属于作者用来研究 20 世纪知识分子历史——尤其是他们的政治史——

的一种方法。因此,他们所产生的影响的问题便被提出。

显然,这种影响是不应该用选举中的措辞来加以评价的。不公正的结构和它的选举结果向来都没有形成知识分子在国家的影响范围。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少数党派从来没能越过统计数字的界限。在这里,甚至无需提及社会统一党,革命民主联盟就是一个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党派的最好例证。即使有许多名望卓著的支持者——尤其是萨特——其结果也是可悲的,1948年,作为创立者的知识分子们傲慢地宣布:“在巴黎,我们必定一个月内有5万名加入者”,然而,18个月以后,革命民主联盟在全法国仅有2000名成员。

用选举中压力集团的措辞来提出问题是徒劳的,其中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些知识分子组成一个边缘模糊不清的社会集团,而且很长时间内都显得势单力薄。但恰恰是这个“狭窄的小社会”<sup>①</sup>,由于界限的不定性及人数的薄弱,往往令人不敢尝试数量上的分析,然而,它却能适合一种更“印象主义”的研究途径。通过请愿书的方法尤其属于此种情况。不过,条件是必须意识到所能掌握的人数将因此而更加稀少。因为,这些请愿书常常形成一种贵族政治的现象,用德布雷的术语来说<sup>②</sup>:“下层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被邀请加入宣言的论战之中,除非那些宣言最终导致真正的请愿书之战。在那种情况下,步兵又成为战斗的主宰,于是,平民被动员起来,走上前线。

大部分的请愿者名单虽然在人数上显得微薄,但却并不因

---

① 让-保罗·萨特用语,发表于阿尔贝·加缪去世后第二天,见1960年1月7日《法国观察家》,并在《形势之六》(加利马尔出版社,1964年,第16页)中被再次使用。

② 参见《法国的知识力量》,雷吉斯·德布雷著,朗塞出版社,1979年。